
沙捞越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史事述略

〔马来西亚〕 刘子政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非常狂妄。它不仅妄想鲸吞中国,还企图掠占东南亚,梦想做“大东亚共荣圈”的盟主,称霸亚洲和世界。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后,即大肆蹂躏南洋(今称东南亚,下同)各地。笔者1936年离开故乡福建闽清,侨居婆罗洲北部沙捞越至今。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岁月里,随父兄一道,同旅居沙捞越的华侨^①,投入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活动。当年轰轰烈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山海修阻,云天远隔,但海外侨胞心向祖国、根在故土的骨肉情谊,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这里我把沙捞越华侨当年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几则史事作一概略介绍。

(一)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凭借武力优势,侵占了大片中国国土,千百万同胞流离失所,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旅居南洋各地的华侨,时时刻刻系念着处于危难之中的同胞手足,忧心如焚。他们解囊捐献,在1937—40年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赈灾运动,把自己胼手

① 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的华人,1957年以前统称马来亚华侨,从法律上说都是中国籍侨民。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独立后,在当地出生的华侨子弟即为马来西亚公民,非当地出生的华侨称为移民或外侨,经确认加入马来西亚籍后亦为马来西亚公民,通称为马来西亚华人。

舐足的辛劳所得,源源不断地汇寄给祖国,支援祖国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侨居在沙捞越的爱国华侨,在首府古晋和第三省诗巫(即西布)的赈灾活动,一开始就十分热烈。在古晋,成立有筹赈会,下设募捐组、义卖组和招募组;在诗巫,1937年秋成立了“诗巫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简称“诗华筹赈会”),1938年一批信仰基督教的侨胞又成立“美以美筹赈会”。它们在城乡各地开展多种多样的募捐筹款活动,得到侨胞的热烈响应。无论是教育界、妇女界、知识界,还是工商界,从富人到劳动阶层,以及中小学生,无不慷慨解囊,踊跃捐输。

这时,马来亚、新加坡、越南、缅甸、暹罗(今泰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及香港等地,也都建立起“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等机构,广泛筹募赈灾款项。为了加强南洋华侨的团结,更好地推动筹赈活动,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和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华侨领袖庄西言于1938年7月在新加坡发起召集了南洋各地筹赈代表大会。沙捞越华侨热烈响应,当即推举古晋代表黄庆昌、黄友谦、涂耐冰,诗巫代表刘家洙、陈仲俎,美里(即米里)代表庄友成、杨毅英共7人出席。^①出席这次大会的,共有来自9个地区的代表

① 沙捞越参加“南侨大会”的7名代表,皆是当地有声望的人士,据新加坡《南洋商报》编印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代表大会纪念册》(1938年10月版)所载,简历如下:黄庆昌(1891—?),福建金门人,生于沙捞越,是荷属东印度(印尼)实业家,经营树胶和土产进出口业,并为新加坡大华银行董事主席、古晋联昌银行总理,时任沙捞越筹赈会主席、华裔商会会长、福建学校董事会主席。黄友谦(1901—?),广东潮安人,是古晋合发号股东经理、民德学校副总理,时任沙捞越筹赈会总务主任兼办事处主任、华南商会常委、潮州公会副主席、华侨俱乐部主席。涂耐冰(1906—?),福建莆田人,时任沙捞越华裔商会座办、筹赈会秘书。刘家洙(1890—1954),福建闽清人,在诗巫创办光南中学、七来小学,为董事长,大东公司经理,时任诗巫筹赈会执行委员、中华商会监察委员、全属华侨登记委员会委员。陈仲俎(1898—?),广东揭阳人,在诗巫经营南发公司京果什货,时任诗巫筹赈会常务委员、中华商会常务委员、华侨登记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小学董事。庄友成(1894—?),美里中华、华侨两校总理。杨毅英,在美里经营杂货,时任美里筹赈会财政。

共 172 人^①，他们共同推举陈嘉庚及庄西言等人为大会主席团主持会议。各地代表报告了筹赈状况及成绩，并详细讨论如何推进今后的筹赈工作，改进汇款购债办法，推销国货抵制日货，推行节约助赈运动，接受和保管侨胞所献债券，介绍侨胞回国服务及捐献救伤医药用品等问题。大会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设总办事处处于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大会通电拥护中国抗战到底，通电慰劳抗战受伤将士及人民，通电慰劳抗日前线将士等，并通过了《南侨代表大会宣言》。^②

“南侨大会”的举行和“南侨总会”的成立，把南洋各地华侨赈灾捐款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诗巫代表刘家洙等人从新加坡回来，首先推动“诗华筹赈会”和“美以美筹赈会”的合并，加强了华侨的团结。他们按照南侨总会的部署，在城乡各地广泛宣传爱国抗日，开展筹赈募捐活动，1940 年末还举行了全省各埠筹赈代表会，推动各地的筹赈活动。1941 年春，他们又推派代表参加了 3 月 29 日在新加坡开幕的第二届南华筹赈代表大会。

南洋各地爱国华侨先后建立起 55 个“筹赈会”（有些地方按照当地环境和华侨公意，也有称“公益社”、“慈善会”、“救国总会”、“援助抗战委员会”等名称的），筹赈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以诗巫为例，举其要者有：（一）定期举办讲演会。每星期四晚上在各华校演讲日军侵略之暴行、同胞受害之惨状以及抗日战争之战况概述等，听讲者不仅有中小学生，还有当地各阶层之侨胞。在讲演会前后，许多侨胞解囊捐款。（二）举行提灯大会，中西乐团、高脚团、舞狮团演出，难民化装队游行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捐赈寒衣，赈募寒

^① 南侨大会的 172 名代表分属 9 区，计：新加坡 12 人，马来亚 74 人，越南 9 人，缅甸 6 人，暹罗 4 人，菲律宾 3 人，沙捞越 7 人，北婆罗洲 2 人，荷属东印度 52 人，另有不属南洋的香港 3 人。代表名单见《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特刊》（新加坡 1938 年版）。

^② 新加坡《南洋商报》1938 年 10 月 17 日。

衣的活动家喻户晓。1937年冬募得2万余件由新加坡转至国内，1938年起以金钱代寒衣一万套，1939年募得现金1·5万元（叻币），1940年又募得1·35万元，均完成了南侨总会分配的数额。（三）以演剧方式筹赈，并在剧场发动献金和义卖糖果、香烟、汽水等。教育界于1938年1月和10月各演出一次，即赈得1万余元（叻币）；妇女界于抗战一周年举办游艺会，义卖券即得5000元；儿童于1939年元旦早晨向各社团、商店、住户拜年博得赏金，晚上在市区表演所得，均作赈款。（四）教育界80余人1940年暑期组成“诗华合唱团”，去各地巡回演出。他们引亢高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游击队歌》等，震撼人心，许多侨胞往往跟着唱了起来，情绪激昂，热泪盈眶，有时忍不住哭出声来。他们有时也演出抗日内容的短剧，表演歌舞。两个月间他们演出30余场，募得4·5万元（叻币）。（五）在元旦、“七七”，双十节、孙中山诞辰和忌辰等各种节日，举办篮球义赛、龙舟义赛、书画义展，义卖花、旗、手工艺品，进行筹赈。

沙捞越华侨和南洋各地的华侨一样，用各种各样方式筹赈的款额相当巨大。在第一年吉普达45万元（内公债15万元），诗巫30万元，美里6万元。^①据不完全统计，南洋各地筹赈的款额，1939年汇往祖国的为7000余万元。此后继续不断地源源汇寄，1942年1月最后3笔汇出合900余万元。据统计1938—1941年3年的筹赈汇往国内的总额达30亿元之巨。^②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筹赈活动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例。其中有一则毁家纾难的故事十分感人：北婆罗洲山打根的华侨郑潮炯，本是一个小商贩。他为了赈济国内的难民，一次

① 据三地代表在1938年10月南侨大会上的报告。

② 《战前新马华人救亡运动》，《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6页。据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抗战经费为18亿元，则南洋华侨筹赈之数可充作一年多抗战经费。

又一次地将自己辛劳所得捐献出来。1940年7月,他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卖给当地赵姓同胞得80元,又变卖了金饰,全部交给筹赈会;然后他离家去四方义卖瓜子,每粒数元、数十元、数百元不等,一粒粒小小的瓜子当然不值一分钱,可是他向爱国华侨大声疾呼宣讲抗日的道理和国内同胞的苦难,感动了无数侨胞。他历经纳闽、汶莱、古晋、诗巫等地,继后又往新加坡、柔佛义卖瓜子达一年余,前后共集得义款4000万余元,全数就地交给各筹赈会汇往祖国。他的卓著成绩和坚毅不拔的精神,不仅受到南洋华侨的赞誉,也受到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和侨务委员会的褒扬,奖以“抗战建国”纪念章和“义举堪风”奖章。郑潮炯的爱国精神,是南洋华侨的光荣。

(二)

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沿海一带和铁路干线多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或封锁,后方公路交通运输日益繁忙。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公路干线是战时交通大动脉;云南昆明直通缅甸的滇缅公路是国际通道,外国运往中国的各种货物和海外侨胞支援祖国的种种物资,多经此输入而转往抗战前线和后方各地。因此,亟需众多的汽车驾驶员和机械修理技工。中国政府向南侨总会发出呼吁,希望派遣志愿机工回国效力。我还记得南侨总会发出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的号召传来,许多热血青年纷纷报名要求回国,挥泪告别父母和妻儿,不畏艰险和牺牲,远渡重洋回到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据记载,从沙捞越回国的有3批:第一批3人,第二批28人,第三批53人,共84人。^①据南侨总会资料,仅1939年一年,南洋各地先后组织了15批共3200多人回国服务,其中9批

^① 刘伯奎著:《抗日时期沙捞越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实录》(2),新加坡长夏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2654人到新加坡集中,经越南西贡、河内至云南昆明,6批538人在新加坡集中后经缅甸仰光、腊戍至昆明。^①此外还有回国从戎奔赴前线的,有参加战地救伤队的。他们为抗战作出的贡献,更是南洋华侨的骄傲。

(三)

侨胞为了表达拥护抗战到底的意志,慰劳抗日前线英勇将士,并考察了解祖国战时各方面的实况,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倡议和组织下,于1940年3月组成“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有各地代表52人,沙捞越代表是卢义湍。^②

卢义湍和回国慰劳团的成员于3月初齐集新加坡。3月5日陈嘉庚在怡和轩俱乐部为慰劳团饯行。该团6日清晨乘轮北上,经长途劳顿,于30日乘车到达云南昆明,4月12日抵达重庆,受到祖国同胞和党政官员的热烈欢迎。慰劳团听取国民政府的介绍后,分3路赴祖国各地慰劳前线将士。卢义湍参加的是西北分团。

回国慰劳团的3个分团千里跋涉,风餐露宿,代表南洋800万侨胞亲切慰问前线将士和伤兵、难民。他们的慰劳活动长达半年,向祖国人民充分表达了侨胞的心声,增进了海内外同胞的互相了解,交流了感情。慰劳团3个分团直至9月底返回新加坡,向南侨总会汇报后返回各侨居地。卢义湍回到沙捞越后,向侨胞作了许多场讲演,还将他拍摄的幻灯片放映给大家看,详细介绍祖国人民艰苦卓绝坚持抗战的事迹和对侨胞赈济的感激之情,给广大华侨以

① 刘伯奎,前引书(1),第7—43页。

② 卢义湍(1904—1948),福建闽清县人,幼年随父兄南来沙捞越侨居于诗巫。在光华初中毕业后曾任政府传译员。后回国在福州英华斋读高中4年。毕业后在闽清六都职业学校任教1年,再至诗巫,在光华、光南、泗芦等校任教,其间曾去爪哇任英文、数学教员3年。他热心帮助福州同胞300人来诗巫谋生,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诗巫筹赈会活动。

巨大鼓舞和慰藉,更加推动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筹赈活动。

(四)

南洋侨胞对祖国抗日战争的声援和支持,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祖国人民也时时系念旅居海外的千百万同胞,1939、1940年,曾先后派出几个代表团分赴近东、印度、南洋各地访问,慰劳。沙捞越的华侨于1940年10月迎来了中国回教亲善访问团。这是中国回教协会派遣到南洋各地宣慰侨胞和联络教友的代表团,在马来亚各地访问历时一年,每到一地都受到侨胞的亲切而热烈的欢迎。许多地方的侨胞社团还组织“欢迎中国南洋访问团筹备会”主持欢迎接待事宜。访问团到沙捞越来的是副团长马天英^①和马达五、吴建勋3人。他们先至古晋,10月15日乘船至诗巫。16—24日在诗巫的各种欢迎会、讲演会、联欢会上,他们先后讲演18场,向各阶层广大侨胞宣传祖国人民坚决抗日的意志和战争形势,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暴行和同胞遭受杀戮的苦难等种种情形。他们的演讲是用国语,但当地侨胞多系福建籍人,所以常常要有两个人来翻译成福州话和厦门话。他们的演讲,使广大侨胞大大增添了对祖国、家乡的炽烈怀念以及对处于苦难中同胞的深切同情。诗巫华侨日报社长刘子钦后来将访问团在诗巫的演讲稿,委托刘贤任编辑成《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演讲录》一书,于1940年12月以16开本油印,在侨胞中流传。

(五)

^① 马天英(1901—1982),回教领袖人物,抗战时在后方一大学任法文教授。1948年被派任中国驻马来亚吡叻州领事。此后留居马来亚,热心于宗教活动,曾任回教福利组织“柏京”(Parkim)华裔部负责人。后在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讲解回教教义,撰写有关回教的著作。由于他对宗教作出的贡献,1972年被马来西亚元首封赐SM勳衔。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后,在太平洋燃起侵略战争的火焰。马来亚等地随即纷纷沦陷,1942年1月29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诗巫。从此,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各项活动转入隐蔽分散的秘密状态,筹赈活动被迫中止。诗巫筹赈会的主要成员刘家洙、卢义湍等27人还于这年8月15日遭到日本侵略军逮捕监禁,受到严刑拷打审讯。但是侵略军的残暴统治,并不能扑灭爱国华侨的抗日意志。他们深夜收听广播,互相传告祖国抗日战争的消息。他们还秘密教唱《大刀进行曲》、《长城谣》、《旗正飘飘》、《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歌曲,以鼓舞抗日斗争的意志。在暗无天日的苦难岁月,南洋华侨一直遥望着北方,企盼祖国的胜利消息。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传来,千百万侨胞特别兴奋和喜悦。他们不仅挣脱了日本侵略者的奴役统治,还看到了祖国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作者单位:马来西亚沙捞越诗巫中正中学退休文史地教员。)

《党史信息报》介绍

《党史信息报》是公开发行的中共党史党建专业报,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及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主办,1986年1月1日创刊,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工作者传播信息,文章短小精炼,信息量大。该报每月两期,每期四版,介绍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新成果、新动向,刊载重大事件和党史人物的专题研究综述、评论,国内和海外研究中共党史的学术动态。